

Vienna and Chicago
Friends or Foes?

朋友还是对手

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

[美] 马克·史库森 著
杨培雷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Vienna and Chicago
Friends or Foes?
朋友还是对手

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

[美] 马克·史库森 著
杨培雷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美)
史库森(Skousen, M.)著;杨培雷译. —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6

书名原文: Vienna and Chicago: Friends or Foes?

ISBN 7-208-06650-7

I. 朋... II. ①史...②杨... III. ①奥地利学派—
研究②芝加哥学派—研究 IV. F0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3748 号

责任编辑 钱敏

封面装帧 钱宇辰

朋友还是对手

——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

[美]马克·史库森 著

杨培雷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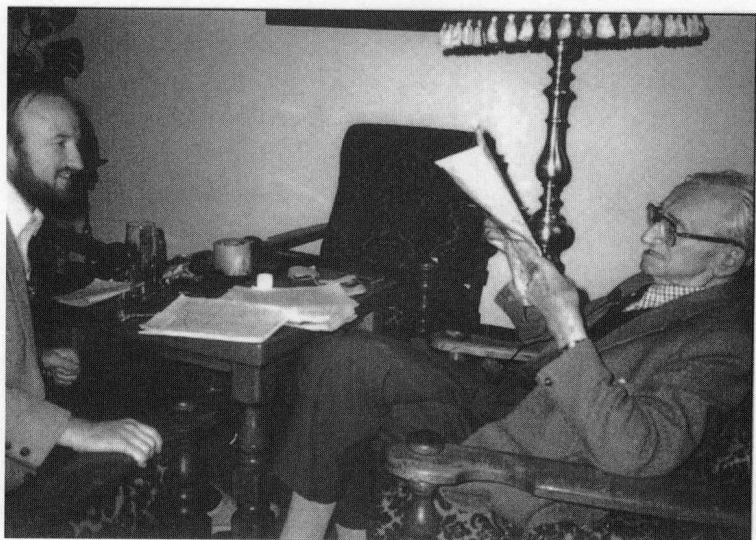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高等教育图书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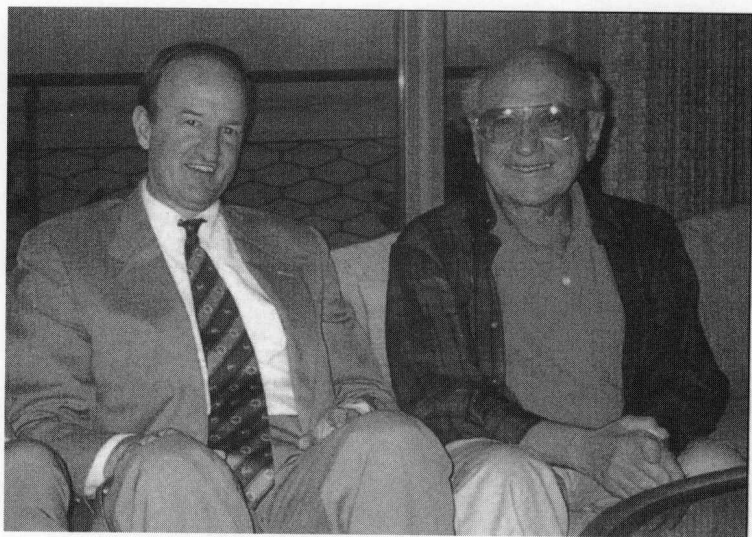
www.hibooks.cn

世纪高教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24 层 021-63914988)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238,000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650-7/F·1511
定价 25.00 元



1986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位于澳大利亚的寓所接受作者采访。这是哈耶克最后一次接受采访。



1999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寓所与作者合影。弗里德曼家中的窗外正是旧金山海湾。

译者的话

奥地利学派^①与芝加哥学派是当代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派,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两大学派在经济思想界独树一帜、光芒四射,对世界经济政策安排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两大学派各自思想的介绍性文献很多,但是,将两大学派的经济思想作出系统比较研究的文献却是空白。《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一书填补了这个空白。

马克·史库森(Mark Skousen)博士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以及《华尔街日报》、《经济瞭望》等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多家跨国公司的财务顾问,著述颇丰,理论与实务兼通。马克·史库森把自己看成是维也纳(奥地利)学派的一员,并对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有所发展。《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一书是马克·史库森的一部力作。

同时,本书也是马克·史库森基于与两大学派代表人物的亲密的私人交往及其对两大学派经济思想的深入剖析而写就的一部力作。全书共分10章:第1章提出本书讨论的主题,即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对手乎?朋友乎?第2、3章介绍两大学派的形成与发展;第4章对两大学派的方法论进行了深入探讨;第5、6、7、8、9章对两大学派的基本理论、核心思想和政策见解进行了生动的比较分析;第10章作出归结,讨论了两大学派的思想趋向。全书结构合理、视野开阔、语言生动、内容深入浅出、分析引人入胜,是一本可读性极强的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佳作。当然,书中的观点仅是作者一家之言,其中的立场、见解,相信读者会批判性地给予判断,取舍。

杨培雷

2006年仲夏写于一心斋

① 作者在原书中,有时用“维也纳学派”,有时用“奥地利学派”,二者都是指同一个学派。

Vienna and Chicago: Friends or Foes?

Copyright © Mark Skousen 2005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6 by Century Higher Education

Book Co.,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第 1 章 引言:两大学派的故事/1

任何一个曾经参加过朝圣山学会会议的人都能够立即发现,这个可以称为“自由主义战士”的国际团体分成两大阵营: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和芝加哥学派的追随者。我谨慎地用“分成”一词,无疑这两个阵营的共同点远远多于不同点。一般而言,他们都是自由市场和自由理念忠诚的信仰者。但是,当涉及到对于方法论、货币、商业周期、政府政策,甚至谁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等基本问题的看法时,他们就显现出对立的观点。

第 2 章 新的和老的维也纳学派/12

——奥地利学派的兴起、衰落与更生

在 19 世纪 70 年代,维也纳大学被看成欧洲最大并且最著名的大学,在那里,奥地利学派的创立者卡尔·门格尔开始了他的开创性的研究,引领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把奥地利学派带入 20 世纪,被看成现代奥地利学派之父。现代奥地利学派复兴于 1974 年,该年度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大约有 50 名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在佛蒙特州南罗耀顿的罗耀顿学院举行了庆祝大会。自从米塞斯和哈耶克离开了维也纳,老维也纳大学的经济系便失去了它的奥地利学派之根。今天绝大多数维也纳大学的教授都会把自己看成“奥地利-凯恩斯主义者”。

第 3 章 帝国主义的芝加哥学派/46

在很年轻的时候,弗里德曼就与芝加哥有关系。1932 年他获得了到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奖学金。在芝加哥大学,他遇到日后成为他的终生的同事、朋友和志同道合者的乔治·斯蒂格勒,还遇到了日后成为他的妻子的罗萨·迪里克特。1938 年,弗里德曼与罗萨结婚,从那时起他们既是生活上的伴侣又是学术上的合作伙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里德曼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芝加哥大学,开始了他的永载史册的功业。几年之后,弗里德曼确立了他的“文化领袖地位”,并创立了著名的“芝加哥学派”。

第 4 章 方法论之争:理论应被经验检验吗? /82

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根据主观动机和对个体行为者以及机构的理解来解释历史,拒绝数学公式和计量经济模型,反对用任何形式的经验检验方法去检验或证实经济假说。对于他

们来说,经济学就是定性分析,奥地利学派学者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是主观的和纯理论的。

芝加哥学派创造了用详尽的经验事实检验理论的方法。用物理学家劳德·凯尔文的话来说,数量分析方法现在几乎被世界上所有大学的经济学家所采用,不做经验研究工作很难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或者说,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至少要参加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课程的学习。

第5章 金本位与信用货币/111

——何者为理想的货币本位?

尽管两派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在自由繁荣的社会里形成一个稳定的、无通货膨胀的货币体系框架,但是,奥地利学派对市场创造和保持稳定的、无通货膨胀的货币体系的能力具有极大的信心,而芝加哥学派认为货币领域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市场失败。

货币体系应当是黄金和基于商品的体系,还是纯粹的信用货币体系或某种形式的自由银行体系?奥地利学派主张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甚至是自由银行体系;而芝加哥学派支持货币主义的法则,即货币供给大致与长期经济增长相适应,这种货币规则要求政府对货币体系实行控制。

第6章 宏观经济学、大危机与经济周期/133

按照奥地利学派和主张“健全货币”的经济学家观点,大危机的祸根在20世纪20年代就埋下了,通货膨胀型的繁荣必然导致30年代的经济崩溃。可是,在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看来,不存在所谓的通货膨胀型繁荣,30年代早期发生的只是紧缩性崩溃,错误不是源自20年代本杰明·斯泰龙掌控下的美联储,而是30年代不再由斯泰龙掌控下的“空洞”的美联储。弗里德曼抱怨美联储于1931年提高了利率,导致货币体系崩溃。奥地利学派则认为,20年代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因而必然破灭。

第7章 反垄断、公共选择与政治经济学/160

——政府的恰当作用是什么?

奥地利学派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一贯反对对经济的任何形式的反托拉斯干预。自熊彼特开始,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就反对“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的剑桥模型。

作为著名的芝加哥“微观先生”,斯蒂格勒起初加入了对大厂商批评的行列,鼓吹要打破私人垄断。但随后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认为私人垄断不应当受到管制。虽然芝加哥学派反对干预垂直型兼并和价格歧视,而对于本质上的垄断,他们认为应加以禁止,因此,大多数芝

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支持禁止冻结价格和水平型兼并的政策。在这一点上,芝加哥学派已经转向奥地利学派的立场,但并非完全转变。

第8章 谁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182

斯蒂格勒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认为《国富论》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它发起了对1500—1800年统治着西欧的重商主义哲学最强有力的攻击。对亚当·斯密的捍卫也来自米塞斯,他同样给《国富论》贴上“伟大著作”的标签。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表现出对亚当·斯密看法的激进转变。罗斯伯德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提出了责难,认为这些古典经济学家放弃了他们之前的理论家提出的健全的理论与法则,声称亚当·斯密的理论是无法得到检验的,“他没有创造任何真理,他的发现都是不正确的”。

第9章 关于资本主义的信仰与质疑/203

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许多学者都会把赞成自由市场作为他们的信仰宣言。相比之下,芝加哥学派属于极大信仰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信仰者。他们认为斯密的闪光点就是认识到在自由市场中买者与卖者自愿交易所形成的价格能够协调千百万人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动,这种行为方式能够增进所有人的利益。同时他们也赞成时常发生的政府干预。而奥地利学派则属于完全信仰自由市场的信仰者,他们不认为存在自由市场作用的例外情况。奥地利学派不仅赞同芝加哥学派关于价格体系作用的所有看法,而且反对政府实施干预措施。

第10章 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未来/228

——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相去有多远?

芝加哥学派通过立足学术界,积极发展市场理论,用强大的经验事实支持模型,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相信他们的立场和观点的正确性。今天,从著名期刊的引用情况和最高级学术奖项的获得情况来看,芝加哥学派对经济思想和原理占据了统治地位。

奥地利学派有能力也有工具优势去达到和芝加哥学派不相上下的成就。但是,这就要求奥地利学派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在顶尖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而不是仅仅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季刊》或《奥地利经济学评论》提交论文,要把参加美国经济学协会年会和其他主流学术会议作为首选,而不是仅仅组织他们自己的分会。

英汉术语与人名对照/238

引言：两大学派的故事

1974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一个巨大的理论转型——对市场优越性的信仰重新确立——这种观点的最终胜利铸就了维也纳学派和芝加哥学派这两大学派的一段佳话。

——丹尼尔·耶金和约瑟夫·斯坦尼斯劳

(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 1998:96)

1994 年 9 月末,亨瑞·莱帕格(Henri Lepage)要我在法国戛纳召开的朝圣山学会作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我热爱哈耶克”,以对 1947 年成立的这个学会的主要奠基者给予一个正确的评价。我想这会是一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题目,但是我错了。不下一打的与会者排着队同我辩论我所赞赏的哈耶克的资本理论和关于通货膨胀与商业周期的宏观经济模型。这场争论表明,批评者都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的追随者。

任何一个曾经参加过朝圣山学会会议的人都能够立即发现,这个可以称为“自由主义战士”的国际团体分成两大阵营: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和芝加哥学派的追随者。我谨慎地用“分成”一词,无疑这两个阵营的共同点远远多于不同点。一般而言,他们都是自由市场和自由理念忠诚的信仰者。但是,当涉及对于方法论、货币、商业周期、政府政策,甚至谁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等基本问题的看法时,他们就显现出对立的观点。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著名的奥地利学派(或维也纳学派)。奥地利学派的创立者是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他在 19 世纪后期任教于维也纳大学,讲授经济学。门格尔的弟子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纳粹统治期间离开了维也纳,在英国和美国延续着维也纳学派的思想。1974年,也就是米塞斯去世后的那一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第一次授予了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

奥地利学派为了得到人们的认可,经历了长期的奋斗。1947年,哈耶克邀请一小部分来自世界各地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参加会议,会议在瑞士朝圣山山坡上的杜帕克酒店(the Hotel du Parc)召开。他对战后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感到震惊。面对战后社会主义的兴起,他决定建立一个团体,旨在坚守自由文明,反对各种形式的集权主义。他在大会上呼吁要坚持亚当·斯密的精神和亚当·斯密主张的“自然的自由秩序”。在与会的38人中,有奥地利学派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和卡尔·布兰特(Karl Brandt);也有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他们后来成为了芝加哥大学市场取向的经济系的领军人物(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的“准市场传统”(the quasi-market)最早可追溯到弗兰克·H.奈特(Frank H. Knight)、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和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的著作。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是芝加哥大学第二代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他们二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于1976年获诺奖,斯蒂格勒于1982年获诺奖)。特别是弗里德曼,他“统治”着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以至于弗里德曼的经济学事实上成为芝加哥学派或货币主义学派的同义语。即使在当今,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在弗里德曼退休后的下一代人眼里,弗里德曼的威望依旧存在。在美国,在全世界,芝加哥学派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巨大影响,而弗里德曼则被看成是活在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

两大学派的共识

作为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学术团体的成员,两大阵营怎么会有如此激烈的歧见呢?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见解,这是事实。但是,总体来说,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成员有着许多共同点。在许多方面,他们可以被看成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经济学(laissez faire economics)的继承

者，哲学思想上的孪生兄弟，而不是敌人。^①

他们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1) 两大阵营都主张私有产权不可侵犯，都认为私有产权是交易、正义和社会进步的基础。

(2) 二者都保卫自由资本主义，坚信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定律，认为个人幸福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来自于个人激励行为，相信自由与秩序最终是和谐的(Barry, 1987:19, 29, 193)。

(3) 二者都支持自由贸易、自由移民政策和全球化。

(4) 二者都赞同开放资本市场、消费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货币市场。

(5) 二者都反对对汇率、价格、租金、工资的控制，包括反对最低工资法。

(6) 二者一般都相信有限政府的意义，主张把政府职能限于保卫国家、私人财产、有选择的公共事务(虽然，在两大阵营中有个别人属于无政府主义者，比如穆瑞·罗斯伯德[Murray Rothbard]和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

(7) 二者都赞成私有化、非国有化和放松管制。

(8) 二者都反对企业福利主义(corporate welfarism)和特权(special privileges)(如寻租或寻求特权等)。

(9) 二者都反对中央计划经济和集权主义。

(10) 二者都相信贫困可以消除，并认为自然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都保卫所有个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的权利，即保卫所有个人拥有财产、使用财产和交换自己财产的权利(假定这些财产都是通过公正的手段获得的)。他们批判企业福利主义，但是，他们并不参与对于富人的攻击。

(11) 二者都反对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干预思想。凯恩斯主义

^① 自由主义哲学家诺尔曼·P·巴里(Norman P. Barry)指出，尽管米塞斯和弗里德曼在方法论和其他命题上针锋相对，但是，“他们都被称为自由之子(受自由主义的启迪)”，他们的文化链条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Barry, 1987:19, 45)。

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市场资本主义存在内在不稳定性，因而需要“大政府”去稳定经济。

(12) 二者都反对赤字财政、累进制税收和国家福利，主张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市场化取向。

(13) 二者都主张通过市场和产权方法解决污染和其他环境问题，通常认为环保主义者过度夸大了环境危机。

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Kirzner)得出的结论是，“不要夸大两个流派的不同，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在重要的政策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二者对于市场运行方式的理解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他们理论上的共同点和理论成就都赢得了人们的尊重”(Kirzner, 1967:102)。

说到理论成就，两大学派都可以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在各自的理论战线取得了各自的成功。奥地利学派早在 19 世纪后期就进行了主观主义的边际革命，此后，在 20 世纪里解析了中央计划体制的结局。芝加哥学派进行了成功的反凯恩斯主义革命，不仅在反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方面，而且在反对微观经济学中的“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模型方面都大获成功。虽然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方面，芝加哥学派明显处于优势，但是，两大学派的成员都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两大学派都时常遭到他们的反对者激烈的攻击，他们的反对者有凯恩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s)。

本书的主题是：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在纠正古典经济学中的错误与对抗资本主义批判者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书的前几章聚焦历史，介绍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在保护和发展亚当·斯密的自然自由秩序理论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重要作用，世界历史一定会大有不同，今日之世界也不会比往昔更好。

两大学派的歧见

尽管两大学派有着上述诸多的可以称道的相同之处，但是的确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他们在哪些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呢？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不同点相当多。尽管他们都可以被看成亚当·斯密自由放任和“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追随者，可是作为继承者他们分化为自由市场经济学的

“两翼”。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区别主要在四个大的方面：

第一，方法论上的区别。奥地利学派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著作作为圭臬，在经济分析中主张演绎的、主观的、定性的和市场运行过程中的分析方法。芝加哥学派则以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作为圭臬，主张历史的、定量的和均衡的分析方法。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主张理论需要得到经验的检验，如果经验检验的结果与理论相矛盾，那么就要抛弃理论或修改理论。米塞斯反对这种历史方法，主张极端的演绎之推论。按照米塞斯和他的继承者穆瑞·罗斯伯德以及伊斯雷尔·柯兹纳的观点，经济学应当建立在“不言而喻的公理”(self-evident axioms)基础上，历史(经验数据)不可能对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尽管对理论怀有某种疑问，但经验数据充其量只能用来说明这种疑问。

第二，关于市场经济中政府恰当作用观点的区别。如何界定市场经济中的外部性问题、公共物品问题、垄断问题、不完全竞争问题和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广度与深度问题？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控制“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的必要性？奥地利学派一贯坚持自由放任政策，而芝加哥学派从长期来看发生了相应的调整与变化(有人说，两大学派都是“反政府主义”的，但是，奥地利学派更加显现出它的“反政府主义”)。借助强大的竞争参与者的力量，亚当·斯密的自然自由秩序足以打破垄断呢，还是针对垄断问题，政府必须实施反垄断法呢？奥地利学派一直主张自然主义和不干预主义。相反，以亨利·西蒙斯为代表的第一代芝加哥学派明显持干预主义观点，他们主张通过干预，打破大公司垄断和其他形式的自然垄断。以乔治·斯蒂格勒为代表的第二代芝加哥学派最初支持西蒙斯的干预主义，但是，最终改弦更张，赞成斯密的信仰，主张依靠竞争的力量和不干预主义。

按照伊斯雷尔·柯兹纳、彼得·鲍特克(Peter Boettke)和其他奥地利学派学者的看法，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甚至还存在着更多的根本性区别。例如，芝加哥学派采用“总是处于均衡状态”的纯粹竞争模型(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称为“类似”竞争模型)，模型中假定不存在完全信息成本。奥地利学派采用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动态非均衡机制模型，模型中考虑了制度因素和分散决策问题(Kirzner, 1997; Boettke, 1997)。关于最优竞

争模型的争论还对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法与经济学以及民主效率问题等研究领域产生了影响。

第三,关于健全通货(sound money)观的区别。什么是最理想的货币本位?两大学派都赞成稳定的货币体系,但是,他们在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歧见。绝大多数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倾向于金本位,或更普遍的形式即市场自发创造的自然形成的商品本位。有些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走得更远,主张实行政府监管最小化的自由银行(free banking)制度,建立私人银行自行发行货币、开立账户、提供信贷服务的竞争体系。相反,芝加哥学派反对金本位,主张信用货币体系,主张货币供给量按照固定比率或中性比率(货币主义法则)增长。二者均主张,对活期存款(demand deposit)设定100%的准备金是最理想的稳定机制。即使关于这点,也有不同。所不同的是,奥地利学派主张用黄金或其他适当的商品作为准备金,而芝加哥学派则主张用法定货币(fiat money)。

第四,在商业周期、资本理论和宏观经济学方面的区别。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和哈耶克创立了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认为法定货币供给的扩张和人为降低利率会导致不可持续的、不稳定的繁荣,最终必将导致经济崩溃。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对于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诸多方面都持反对观点,他们主张货币总量模型(aggregate money model)。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赞成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和《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中提出的政治理论,但是反对他的资本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因此,在1994年我的一次演讲之后,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同我展开辩论。)弗里德曼认为,与经济平均增长率相一致的货币供给的稳定增长能够为经济提供可持续的非通胀的环境。但是,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并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处于怎样的水平,给定的通货膨胀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许多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芝加哥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和总量分析(如国民经济统计、价格指数)作为有效的分析工具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对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原因和拯救方案存在着争论,关于宏观经济模型构建中的适当的总量水平存在歧见,常常关于凯恩斯、凯恩斯主义者、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家和其他经济学派也存在着不

同的看法。他们甚至就他们的目标以及对于学术界和公众应当达到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本书将对以上所有问题进行分析，试图弄清两大阵营各自拥有的最具说服力的观点。在每一章的后面，我会在“维也纳学派的优势”或“芝加哥学派的优势”题目下面给出我关于哪一个学派占优的看法。在对两大学派的全面评论之后，在最后一章里，用芝加哥经济学家谢尔文·罗森(Sherwin Rosen)的话来说，就是对两大学派思想的交流中的收获作出评价。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相距有多远呢？经过时间的推移和相互的对话，答案将更加明确。希望通过本书的阅读，读者会看到两大学派思想是接近的。虽然就两大学派观点的本质而言（我会努力把它们揭示出来），二者的差距不可能完全消除，但也不应该鸿沟依然。在最后一章里，我提出了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两大学派应当朝着有利于学术界和经济科学发展的方向前行。

我所接触的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

我对两大学派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多年的深入的研究并且与两大阵营的领导者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我站在不同寻常的立场上去剖析每一个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阅读奥地利学派学者的著作，我第一次接触了自由市场经济学。在我父亲的图书室里有十多本主张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书籍，其中就有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人类行为》(*Human Action*)。在我阅读这本书时，才发现对于我这样一个少年来说，它的篇幅长而且难以理解。此后不久，我就开始阅读亨利·哈兹里特(Henry Hazlitt)的《处在教训之中的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自由人》(*The Freeman*)月刊和威廉姆·F. 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主编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半月刊。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在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第一次修读了大学经济学课程，使用的教科书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济学》(*Economics*)。当时，我对大学里的保守倾向感到吃惊。在我认识到教科书里的凯恩斯主义倾向(拥护节俭悖论、赤字支出、累进制税收和福利国家)以后，我曾请我的一个老师拉里·温默(Larry Wim-

mer),教我如何在阅读方面作出选择。当时拉里·温默教授刚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他建议我去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书。我从头至尾阅读了《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发现作者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分析似乎还不全面、不彻底,但却提出了针对干预主义的有力的矫正思想(当然,弗里德曼关于凯恩斯的看法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详见第8章)。

恰恰在这个时候,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结识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穆瑞·罗斯伯德(Murray Rothbard),他向我介绍了奥地利经济学的全新观点。他是第一位“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与米塞斯常常显得沉重的、书生气的写作风格相反,他那散文般的著作,是那樣的清丽、晓畅并富有说服力。我对他的极具可读性的小册子《对于我们手中的货币,政府做了什么?》(*What has Government Done to our Money?*)和《伟大的米塞斯》(*The Essential Mises*)印象极深。我带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该书介绍了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并用它来分析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罗斯伯德的著作洞悉生活之变,令人大开眼界。在我看来,解读罗斯伯德的感受就像萨缪尔森阅读凯恩斯的感受一样。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罗斯伯德的思想,我阅读了他的大量作品,包括《个人、经济和国家》(*Man, Economy and State*)、《权力与市场》(*Power and Market*)以及其他所有的著作。总之,我迷醉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

在我的整个大学时代,我一直痴情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我得到了部分资助,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论文成书之初由米塞斯研究院(Mises Institute)出版,后来由经济学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出版。书名是《关于完全金本位的经济学分析》(*The Economics of a Pure Gold Standard*),本书受到的罗斯伯德所主张的100%黄金准备标准影响甚深。70年代中期,在我离开中央情报局(CIA)去为罗伯特·凯菲尔特(Robert D. Kephart)和他的金融时事通讯王国工作时,我与罗斯伯德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如彼特·鲍特克、里查德·艾伯林(Richard Ebeling)、罗格·格里森(Roger Garrison)、汉斯·圣豪兹(Hans Sennholz)和华特·